

远古文明起源的生态思考

谭卫华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20世纪40年代以后学术界为了给远古文明一个科学的解释, 开始致力于探讨这些远古文明在特定地区发展的驱动力, 然而得出的答案则异彩纷呈。历史学学者阿诺尔德·汤因比提出了“综合起源学说”; 同时, 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朱利安·斯图尔德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 提出“文化生态学说”。综合比较前人研究的成果, 重点剖析汤因比和斯图尔德的文明起源学说之间的非兼容性。并针对这种非兼容性提出了文明起源的新见解, 强调多元并存文化之间冲突与互动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 文明起源; 生态背景; 冲突; 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1)01-0022-05

20世纪40年代以前, 不管是世界史研究, 还是文化人类学研究, 都不甚关注生态环境对文明起源的影响, 这显然与那个时代生态系统生态学在理论上有欠成熟直接相关联。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不同, 斯图尔德提出了有名的“文化多线进化学说”, 在史学方面由汤因比提出了早期文明的“适度压力胁迫起源说”, 但对比两者的理论依据却发现其间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异。斯图尔德一反前人的研究, 坚持认为技术发明必然是针对具体特定的生态系统而作出的应对, 而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又千差万别, 因而特定的技术发明不一定都能确保远古文明的诞生。因而将衡量文明起源的标准重点放到人口的集合密度上,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社会整合模式”。这一全新的概念认为, 超越家族血缘的地域文化才与文明的起源直接关联。而汤因比则主张: 环境压力的胁迫对文明的催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环境压力过大时, 远古的人类就难以承受, 无法生存, 人也无法发展; 环境过于优裕, 远古人类不会奋进, 文明也无法发展。因此, 他认定处于好与不好之间的适度环境才是远古文明发展的理想之地。

对比这两位学术界前辈的结论, 很容易注意到, 两者的立论都植根于文化所处的生态环境, 但在如下三个方面却不相兼容:

首先是, 对环境好坏的评估标准两者无法统一。斯图尔德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鲍亚士的“历史特殊论”, 因而认定对特殊的生态环境来讲, 根本无法对环境的“好”与“坏”, 以及好坏的程度作出评定。这就意味着汤因比所说的“适度胁迫论”会因为失去了客观可比标准而无法成立。

其次是, 斯图尔德坚持认为在有限的范围内, 人口的密集才会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和行政功能的高效化。他推论说, 如果好的社会环境容易导致人口密集, 那么远古文明显然应该最先出现在环境最好的地方, 但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很多远古文明起源地从今天看来非常差。这样的理解与汤因比的学说显然背道而驰。

最后是压力的来源问题。按照汤因比的理解显然是环境对相关远古人群施加了压力才催生了远古文明, 但在斯图尔德看来, 由于文化有能力适应于所处的环境, 因而不管环境的差异有多大, 文化一经适应后就无压力可言。反倒是, 人群与人群之间构成的社会压力对远古文明的产生, 所发

* 收稿日期: 2010-01-15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基地委托项目(09J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谭卫华(1978-), 女, 苗族, 湖南城步人,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 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族际关系与人类环境活动研究。

挥的作用更直接。

如果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不能有效沟通,并求得两者的兼容,生态环境对远古文明的起源中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就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有趣的是,斯图尔德在他的《文化变迁论》一书的第十一章,借助了世界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和美洲文化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将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中国(中国黄土高原)、中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南美的印加文明做了系统的比较。当然它的比较仅是罗列了上述五个民族之间的具体差异^{[1] 181-182},目的在于证明它的文化生态学说的可靠性,却没有认真地细究上述五种古代文明在所处的生态环境下是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因而所处环境的具体作用仍然没有得到明细的解释。相反,在汤因比看来,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与中国都应当都属于他所称的不好与不坏的生态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远古文明。在这一点上,汤因比的上述分析显然比斯图尔德高明得多。只要抛开汤因比的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标准,事实的真相就可望得到合理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人、古两河流域人和古印度的达罗毗荼人,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都恰好位于北回归线附近,也就是地理上所说的半干旱沙漠区。古代中国人所处位置虽然偏北,但它比前三种文明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黄河中游地带也属于半干旱的内陆地带,而且与沙漠毗连。应当说远古文明出现的这一地理区位,确实存在着毋庸置疑的相似性。然而,这一地区从今天的发达农业来看,显然都不是理想地带。另外一种相似性在于前三种远古文明都位于重要河流的季节性洪泛带,这些重要河流都发源于山区,夏季河水都要泛滥,冬季时河水又会回归河床。这种状况对处于黄河流域、泾河、渭河和汾河的古文明发祥地带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有理由将远古文明起源的这一相似性归纳为“季节性洪泛带起源说”。而阿兹特克文明也处于北回归线南侧,也是河谷盆地,也属于季节性洪泛带。只有印加文明是例外,它处在高原山区。从生态构成的角度看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植物种类相对单一,草本植物占据优势,同时又是迁徙性大型食草动物群和各种迁徙性动物会季节性成群汇集的地带。而古代的黄河河谷地带,也是以草本植物为主,但河谷台地上却有相对茂密的森林。大型食草迁徙性动物也会季

节性地成群汇集于黄河河谷地带。而墨西哥盆地情况则不同,这里动植物种类繁多,生长茂密。印加文化所处的生态环境相对凉爽,动植物种类构成丰富,与上述文明所处的生态环境差异较大。

当然,这样的比较仅是就大致情况而言,若细究其间的差异以后还会发现,上述各古代文明的起源地其环境都存在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视为很不相同的生态结构,但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具有十分接近的相似性。而且这三者都是远古文明出现最早的地带,因而不能排除这样的地带与远古文明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除了汤因比和斯图尔德以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所处生态环境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最有代表性的见解有三:其一是“气候变迁说”;其二是“人口压力说”^[2];其三是“适宜农耕说”。气候变迁说的持论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末期全球气候发生了剧变,使得远古古人凭借习以为常的狩猎采集方式为生变得极为困难,才被迫改变觅食方式。从而导致了农业与游牧业的出现,远古文明才有了诞生的经济基础。与此相类似的观点,虽然持之有据,但却无法解释为何远古文明只在这三个地区产生而不在其他地区产生。与此同时,还需要注意到所谓全球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言在时间跨度上无法吻合,气候变迁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而远古文明的产生所经历的时间却十分短暂。在这两者之间从时空跨度上都很难建立起必然的关联性来。而后期的远古文明不管是中国还是巴勒斯坦却都跨出了上述三个地带。但分布范围仍然相对集中,没有遍及全球,这也很难用气候变化去加以说明。更值得注意的是,三河流域都处在北回归线附近,全球气候不管是变暖,还是变冷对这三个地区而言,其影响从纯自然的角度看都不显著。这更难将文明的起源归因于气候的变迁。相比之下,全球气候的变暖对安第斯山区和黄河流域应该是最明显的,但黄河流域的古代中国文明却滞后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这就更难用气候变迁去作出说明。

“人口压力说”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因果倒置的悖论。任何形式的文化在特定的单位面积内能够供养多少人口是一个定数^{[1] 41-42}。人多了就可能会有纷争,战争和迁徙也会随之而至。战争和迁徙的后果,又会使得环境与人口重归于平衡。如果不遇到特殊的背景和事件,人口都不会超载,即使有了超载也不能长期维持。因而在单位面积

内,人口的密集应当是新类型文化产生后才会派生出来的新现象,而不是倒过来由于人口的密集而导致新文化类型的产生。“人口压力说”显然存在着天生的逻辑矛盾。但考虑到由于多种文化并存也可能导致人口密集,因而这一观点值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加以审视。

至于说远古文明的发祥地都适宜于农业耕作则缺乏事实根据。事实上,上述几个远古文明的发生地不管是从传统农业角度,还是从现代化集约农业的角度看,都不是理想的农业区。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地表并不平坦,而且土地极易盐碱化。表土的理化结构差异又很大,这才使得当代最发达的农业区不在这些地区,而是在北温带平原区。而传统的稻作农业则集中在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平原区。说远古文明的发祥地全都适宜于农耕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不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有一点得申明,上述列举的各远古文明就本质而言并不是原则意义上的“农耕”,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游耕”。这些远古文明虽然也种植作物,但是很少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农耕,几乎都是采用木制或石制农具耕作。也没有使用畜力牵引犁耙翻耕土地。所种植的作物中,主种作物并不明显,大多实行混合播种。农作物的播种和收获期参差不齐,而且耕地不固定。这些特点都与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是具有“游耕”类型生计的基本属性。因此,将远古文明的诞生不加区别地理解为固定农耕与史料的记载相左。探讨远古文明的诞生得立足游耕生计不能与固定农田耕作相混。

综合比较前人的研究成果后,我们认为远古文明的起源不是某种民族文化独立发展起来的历史事实,而是多种文化并存互动作用下通过跃迁式发展才建构起我们今天可以获得准确物证的远古文明。只有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由于进入史册的时间很晚,它们的属性可以在文本史料中直接找到证据,这也为我们推测古代文明的发生提供一些新的证据。总之,世界史上公认的这些远古文明虽然在表述上把它们称为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达罗毗荼文明和华夏文明等等,但这些远古文明起源之际,这些地区还并存着多种其他民族文化,载入史册的仅是这些文明的最后胜利者而已。文明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绝不是由这些单一民族完成,而是众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即使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古埃及文明的史料中,也可

以确凿无误地发现当时整个尼罗河谷并存着众多的邦国,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人也常常与尼罗河谷的民族不断发生战争。此外,尼罗河两岸的沙漠中还有很多狩猎采集民族与尼罗河地区的居民不断发生纷争。到了古埃及王国的晚期,来自巴勒斯坦的居民也经常与尼罗河的居民对垒。

上述各种情况对世界史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继承了这样的研究成果后,由于专业的习惯总不免会从民族文化多元并存延续的角度去审视远古文明起源的原因,都会很自然地想到围绕着尼罗河河谷的多种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才是催生古埃及文明的必备条件。按照塞维斯的理解,新文化类型的出现都是通过跃迁式的方式完成的,能够完成跃迁的绝对不是单种民族文化,而是多种民族文化的临时性的拼合体。塞维斯将这样的拼合体称为“合子”文化。他认为只有“合子”文化才能孕育出新类型的文化来^[3]。如果用塞维斯的学说去解读远古文明发祥的具体史实,那就应当这么说:由于特殊的原因,众多的狩猎采集民族荷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特定的时段内,汇集到了尼罗河谷,经过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和互动甚至是激烈的战争,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合子”文化,并在这样的合子文化中萌生了游耕类型文化,使人类文化在“一般性进化”的阶段上,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并在这种新的游耕类型文化中孕育出古埃及文明来。

除了古埃及文明外,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其诞生的过程都与此相似,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由于诞生比较晚对有关传说的记载更为丰富。远古文明的这一特殊诞生过程可以描述得更为具体。这四种古代文明的相似性充分表明,并存多元文化的互动才是催生远古文明的必备社会文化背景。

我们将远古文明的起源理解为并存多元文化冲突碰撞中跃迁突变的产物,这与前人的理解当然很不相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

其一是远古文明起源的前身,肯定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4]。如果按照塞维斯的提法远古文明起源之际在民族文化谱系上肯定是间断的,产生的地域也是间断的。而前人的研究一般都是坚持“单线进化思想”,因而他们理解的文明起源在谱系和地域上都是连续而不中断的。

其二是我们认为远古文明的起源在时间上是

突变的, 远古文明一旦产生, 其类型、基本结构、运行方式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关系都会整体上与它的前身截然不同。具体到远古文明起源的游耕类型文化而言, 其前身肯定属于狩猎采集文化。而这些远古文明都属于游耕文化, 其生计方式都表现为靠不固定的多物种的混合种植模式为生, 而不是直接采集各种野生动植物为生。而前人的研究则基本沿袭“渐变式进化”原理, 坚持认为是不断的积累技术和知识, 才最终产生了远古文明。

其三是远古文明的发祥地必然是那些允许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的区段。由于远古的各种狩猎采集民族, 他们的觅食手段会各不相同, 也就是说在这一文化类型内部也存在着样式差异。诚如斯图尔德所指出那样, 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在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各民族中的调查表明, 每个父系“队群”都以特定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物来源, 以至于这些“队群”可以用其食物作为其“队群”名称使用^{[1] 115-116}。这种情况应当是远古文明产生以前就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而导致多个民族密集分布于一个狭小地带的动因在于这样的地带其生态结构极其复杂多样, 从而使得相关的远古民族都可以在这里勉强为生, 但不可能获得更大发展。原因在于不管什么样的生态结构在这, 其规模都过于狭小。尼罗河河谷、两河流域河谷和印度河河谷都具有这一属性。黄土高原和安第斯山北部也具有类似的属性, 因而它们很自然地成了远古文明的摇篮。而前人的研究或者偏重于全球性的气候变迁, 或者含糊其辞地说是不好又不坏的环境, 但这样的提法显然没有切中要害。

其四, 我们坚信民族文化与个人生命一样必然具有不可中断性。文化传承上的断裂不允许延续哪怕几天的时间。因为超过这一时限后个人的生命就无法延续, 文化更无法延续。因而远古文明的起源必然是已有各种文化知识积累、技术传承、技能培育已有充分基础的前提下, 通过重新整合而完成的创新过程。因而促成远古文明诞生的直接动因, 只能是那些持续时间很短的爆发性因素而不可能是长期持续的因素。具体而言, 民族间的战争最具有这一催化作用。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认同汤因比的相关论述, 但并不认同两个民族的长期对垒式的战争具有类似作用。从这一理解出发气候变迁、人口压力、文化传播、知识积累显然都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催化作用。前人立足于类似因素提出的文明起源学说在这一点上难以成立。

斯图尔德强调生态环境在文化的变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同时又强调文化总是要通过技术手段去利用自然, 因而生态环境本身不发生剧变, 相关文化的知识技术和技能体系就不会失效。当然, 其间也不存在必然的动力足以驱动技术的创新。基于这一理解斯图尔德坚持认为技术的演进可以滞后于整合模式的提升。因而生态环境对文明起源能发挥的影响是一种长时段的稳定的影响力。如果生态环境的变迁是全球性的, 那么相关民族文化中的技术体系可以通过新陈代谢的方式逐步适应这一变化。其结果只能导致谋生手段的样式差异而不会必然带来文化的跃迁。鉴于远古文明的起源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均衡, 在时间维度上也参差不齐。因而一般性的生态背景改变与远古文明的起源不存在相关性, 与远古文明有关的生态变迁必然具有独特性。其独特之处在于:

首先, 必须是多种生态结构在狭小区域内密集并存延续的区段。远古的三大文明起源地都具有这一属性。其次, 这样的多元生态结构还应当在时间延续上具有波动性, 波动振幅越大越缺乏规律性对催生远古文明的作用越显著。因为只有有这样的波动下才会产生文化变迁的胁迫力。最后, 自然力在这一区段的活动还必须十分活跃, 从而导致在这样的狭小地区物质能量的流动可以不断地刷新。其内在结构这样的刷新可以给人类的利用方式转变铺平道路, 减少阻力。具体到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而言, 涨落无常的河水正好扮演了这一角色。河水的涨落不仅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和水分, 同时还不断刷新生物物种的组成。给觅食方式不同的各远古狩猎采集民族的觅食造成变化无常的机遇和灾祸, 从而成为迫使相关民族启动文化重构跃迁式发展的原动力。此外, 河水的涨落无常还导致高大的乔木不能长成, 土地的盐碱化的区段不会一成不变。土壤的理化结构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而且后三种结果可以使生产力低下的远古人在改变资源利用方式时承受的阻力最小。事实上, 上文列举到的六种古代文明都是在完全不使用金属工具, 甚至没有陶器的情况下单凭使用木制工具就能确保稳产高产和牲畜的顺利饲养。相比之下, 波动性最小的热带雨林、极度干旱的沙漠、北极苔原带、北欧的疏树草地平原正因缺乏变数而无法催生远古文明。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顺序最具综

合佐证价值。中国大陆变数最大的地区就是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但恰好是生物产出水平较低的地带。我国南方的长江和珠江平原,生物产出水平很高但无论哪一方面的变数都不大,因而中国的远古文明最早出现在黄土高原而不会出现在长江和珠江三角洲。

前人的研究大多只关注静态的生态结构和自然要素的匹配,而不太关注生态背景和无极背景的动态过程。因而很难说清为何远古文明只在少数区段出现而不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出现。

远古文明社会压力起源说理应包括如下一些基本内涵,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都具有其独特性,同时并存延续的同类型民族文化仅是其中的极少数会参与远古文明的起源。有幸参与的这些民族都是因为它的文化具有较大的变数也就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高度特化的生活极为富有的民族一般不会参与新类型文化的跃迁过程。不同民族文化间由于自成体系,其间都存在着信息隔膜,以至于文化要素的传播不像前人想象那样可以随意自由流动。如果不是受到内外压力,任何民族都不会主动接受外来文化。即使接受了也必须加以消化和吸收以便保持本民族文化的整体性。这样的传播仅是空间位移,不会必然催生新类型文化。只有民族间的剧烈冲突碰撞才能突破信息隔膜,带来文化要素的快速传播和迅速整合。这才

会导致远古文明的产生。所处生态环境对文化的模塑作用是一种持续性的影响,都不会必然导致远古文明的产生。只有那些生态结构极其复杂又充满变数,而且无机自然要素的波动又极其剧烈的特殊区段才能支持多元文化并存,才有利于诱发文化间的冲突与碰撞,也才允许超常的人口密集。这样的特定生态区段才可能是远古文明的发祥地。

我们的理解与认识可以确保斯图尔德与汤因比的思想可以有效兼容,同时又能排除远古文明起源原因分析上的习惯性偏颇,基本上能做到对远古文明起源的各项特征获得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Julian Steward Theory of Culture Change: The Methodology of Multi-linear Evolu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5
- [2] Harnet M J Population Pressure and the Social Evolution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970(26): 67—84
- [3]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 民族文化与生境[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257.
- [4]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M]. 刘北成,郭小凌,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73

[责任编辑: 罗康智]

Ecological Views on Ancient Civilization

TAN Wei-hua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it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e academics after 1940s began to take up with the questions like why these ancient civilizations occurred in specific regions and what their motion was but the answer was quite different. Historian Arnold Joseph Toynbee put forward synthesized origin theory and the same time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Julian Steward proposed cultural ecology theory that answer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compatibility of the origin theory by Tang Yinbi and Steward and proposes new points of civilization origin in social pressure origin theory according to their incompatibility. This new theory put emphasis on the conflict and interaction among multi cultures.

Key words civilization orig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flict cultural interaction